

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南洋华侨与祖国的抗日战争

陈 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四月

南洋华侨与祖国的抗日战争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华侨的阶级出身、出国的历史原因及其在国外的处境，说明海外华侨所具有的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文章中心是以具体、确凿的史实和统计数字，从财力（包括筹赈义捐和多寄赠家侨汇）、人力与物力（包括华侨青年回国参军杀敌、组织机工回国服务团、战地救护队等，以及征募寒衣、捐赠药品、医疗器材、救护车等战时急需物资），以及抵制日货、罢工辞职等斗争、反对妥协、坚持团结抗战的宣传鼓动（包括组织回国慰劳团）等方面，阐述南洋华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对祖国所作的巨大贡献。

结尾，根据战后东南亚地区华侨的绝大多数已经参加所在国的国籍、成为当地公民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的侨务政策，对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和外籍华人，分别提出原则上的要求和希望。

现在的东南亚地区，在我国历史上曾称为“南洋”，因其位于我国南方，而远隔重洋之故。这一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除暹罗（今泰国）外，都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即法属越南（今印支半岛的越南、柬埔寨与老挝），英属缅甸、马来亚（包括独立后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美属菲律

宾，葡属帝汶等。

我国人民移居国外，已有悠久的历史，但集中、大量地出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贫苦农民与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失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国外去谋生，有的被殖民主义者拐骗当“猪仔”，被贩卖到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去当劳工。同时，由于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迫害，又有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海外。突出的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在清王朝的疯狂镇压下，大批起义将士逃往南洋各地；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有一批革命志士被迫流亡国外。这些人出国后，在残酷的压榨下，不少人死于非命，幸存下来的则世代相传，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以吃苦耐劳著称的华侨。

据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统计，当时我国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人数达八百七十万，其中的82%（7,134,201人）是集中在南洋地区。现将南洋各属华侨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南洋各属华侨人数统计表①

侨居地	华侨人数
越南	462, 466
缅甸	193, 594
暹罗	2, 500, 000
马来亚 (包括新加坡)	2, 358, 335
北婆罗 (包括沙朥越)	154, 034
东印度群岛	1, 344, 809
葡属帝汶	3, 500
菲律宾	117, 463
共计	7, 134, 201

资料来源：根据我国驻外各使领馆 (1937—1946) 之调查报告及当地政府所发表之文件

又，新加坡《南洋年鉴》关于三十年代南洋各地的华侨人数统计如下：②

越南：	326,000人
缅甸：	193,594人
暹罗：	445,274人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2,107,015人
北婆罗（包括沙朥越）：	234,266人
东印度群岛：	1,098,927人
荷属帝汶：	3,500人
菲律宾：	83,993人

共十： 4,492,569人

两相比较，总额数字相差颇大，主要差异是对暹罗华侨的统计，“侨委会”把那些已经归化暹罗籍的华裔，仍然作为具有中国国籍的华侨而统计在内。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区的数字则比较接近，或完全相同。两相参照，可以说，当时南洋华侨人数为四百五十万的数字，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这四百多万的南洋华侨，根据共产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出版的《国际劳工通讯》在1940年统计，经营商业者居多数，约占62%；其次为工矿业，约占23%；再次为农业，约占17%；其它各业占

8 %。(3)

上述数字是按行业统计，把商业资本家同店员、小商贩计算在一起作为商业者；把工矿业资本家同产业工人一起作为工矿业者；把种植园主同农业工人、个体农民计算在一起作为农业者。实际上，“华侨大部分还是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商贩等。”“资产阶级是华侨中的极少数，其中大部分是中、小资本家。”④

海外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他们无论是为生计所迫而背井离乡，或被拐骗当了“猪仔”，或因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由于身处异域，寄人篱下，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与迫害，投诉无门，因而更加迫切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富强，使他们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使他们摆脱“海外孤儿”的苦境。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说过：“海外华侨捐资救国，纯为热情所驱，……推倒满清共赴民国，救济灾难，捐输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千万人同一心。”⑤这都是充分事实作根据的。从历史上看，在祖国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抗灾救济以及投资建设中，广大华侨无不热诚支持。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侨被誉为“革命之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更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和祖国人民一起，敌汽同仇，英勇奋斗，作出巨大贡献。宋庆龄在抗日期间曾指出：“海外各地的华侨，在其居留地政府统治下，久已深切体会到被压迫民族之待遇与痛苦，所以，更加能够了解

祖国之兴衰存亡。关系与华侨之福利更大。俱有国家观念。勇于抗战救国。”⑥

二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抗日战争工作时指出：“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⑦这是对华侨在抗日战争中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华侨为了支援祖国抗战。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的贡献。当时作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曾经指出：“很多华侨在困难复杂的情形下。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筹款捐助医药和医疗用品等。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许多华侨青年直接参加抗日战争。”⑧现将南洋华侨在抗日战争期间对祖国的主要贡献。分述如下：

（一）财力的支援。由于南洋华侨在海外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有条件在这方面作出突出的贡献。当芦沟桥的炮声传到南洋时。不愿作亡国奴的广大侨胞。纷纷发起筹赈捐款。支援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随着战争的发展。第二年（1938年）。为了使筹赈。购债汇款及其他救亡工作得收统一行动之效。而加速进展”。⑨

经荷属东印度侨领庄西言倡议，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到会的各属代表一百七十余名。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并推举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为该会主席，庄西言（荷印侨领）李清泉（菲律宾侨领）为副主席。总会采用“筹赈”名义，是为了“适应各居留地之环境情形，而实际上的工作与精神上之号召，则不限于筹赈”，“除一部分属于筹赈性质者外，大部分皆为政治与外交之重要工作。”^⑩南侨总会的成立，是南洋华侨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南洋华侨第一次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有了共同的行动纲领，打破了过去帮派观念和地域界限，实现了华侨的爱国大团结。

为了适应南洋各地的复杂环境，南侨总会属下各筹赈会的名称，各不相同，如马来亚和暹罗各地称“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缅甸所属则称“华侨救灾会”，菲律宾多称“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越南则称“华侨救国会”或“华侨缩食救济兵灾慈善会”，荷属东印度多称“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或“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等等。

各地筹集捐款的办法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舟车小贩之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等。在义捐活动中，如陈嘉庚、李清泉等轻财爱国、

捐献成千上万元的富商，固不乏人，但普遍的、大量的，还是那些收入微薄的劳苦大众。正是那千千万万的普通工人、农民、小贩、人力车夫、店员、教员，将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以及平日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有限积蓄，奉献给祖国。陈嘉庚曾颇有感慨地对人说：“热心赞助祖国抗战，愿意对抗战中的祖国投资的，不是南洋资本家，而是广大的华侨劳苦大众。”^{①①}正是这些劳苦大众所奉献的微薄收入，好象涓滴之水，聚集成细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汇成长江大河，发出巨大的力量。

我们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的二十六个月期间，南洋各属华侨原认捐数与实际完成数的对比中，可看出华侨踊跃捐献的爱国精神。如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原认捐数为34,762,000元，实际完成85,143,648元；北婆罗洲等地原认捐数为624,000元，结果完成3,313,289元；荷印巴城等地原认捐数为14,157,250元，结果完成31,535,287元；菲律宾、缅甸、越南及暹罗、香港等地，原认捐数为27,300,000元，结果完成31,294,450元。^{①②}无不大大超过原计划数额，足见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

据南侨总会统计，1939年至1941年三年间，南洋各地（除暹罗外）华侨人数及逐月捐输，平均比较如下：^{①③}

地区	华侨人数	平均月捐输额(国币)	每人平均(国币)
菲律宾	14万	700,000	5.00
马来亚	230万	4,200,000	1.80
缅甸	45万	540,000	1.20
荷印	160万	1,600,000	1.00
越南	45万	200,000 ⁺	0.50
北婆罗及 暹属小埠	——	100,000 ⁺	——

上表金额系按1939年——1941年三年平均汇率，即新加坡币15元汇国币100元。南洋华侨总计约五百万人，每月平均捐献国币7,340,000元，一年即是国币八千八百多万元。这仅是义捐，如果加上华侨汇寄家乡的赡家侨汇，则每年汇寄祖国的外汇，就是很可观的数目了。据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估计，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底，南洋华侨逐年汇款数目是：1937年下半年约三亿元，1938年约六亿元，1939年约十一亿元，1940年约十五亿元，1941年约十七、八亿元。⁽⁴⁾

由于华侨汇款，向无精确统计，除经由银行汇款可以查考外，凡由私人机构(侨批局)汇款，则无法统计。根据历年各方估计，战前

华侨（包括世界各地）汇款，平均每年二亿五千万至三亿元。^⑮而1939年至1941年，平均每年侨汇达国币十亿元左右。

在旧中国，华侨汇款历来是抵补入超的一大源泉。旧中国是年年入超，但经济上还未濒于破产，是因有侨汇来抵补的缘故。根据《中国贸易年鉴》统计，我国战前数年的入超数字是：1928年为二亿三千二百六十万元，1929年为二亿六千零九十万元，1930年为四亿八千八百一十万元，1933年为八亿零七百二十万元，1934年为五亿六千八百七十万元。^⑯历年入超，主要是依靠侨汇和外国人在华费用来弥补。

根据高事恒统计，南洋华侨汇款在抵补入超所占的比例，是极其可观的。

南洋华侨汇款与抵补入超比例表（单位：国币）^⑰

年 度	南洋汇款数	贸易入超数	抵补百分率
1931	568.020	655.361	86.67%
1932	308.882	820.507	37.69%
1933	279.074	762.025	36.62%
1934	244.398	535.683	45.62%
1935	274.804	343.400	80.02%
1936	315.356	235.000	134.19%

资料来源：

(1)侨汇数字根据中国银行及吴承禧氏统计。

(2)贸易入超数字根据海关册。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汇与祖国的抗战，更是关系重大。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曾以1939年的侨汇为例，作如下的分析：1939年一年间，“南洋华侨寄家信及义捐，汇来七万万元，美洲等地华侨（汇来）三万万余元，合计国币达十一万万元，……按世界银行公例，如有基本金一元，便可发出纸币四元，如此便算稳健。华侨汇款概是现金，政府将此十一万万元现金，作为纸币基金，即可发出四十四万万元纸币。除十万万元为华侨寄家费之款，尚余三十四万万元纸币。故银行每年可借（贷给）政府买债券数十万万元。据何（应钦）部长言，去年（1939）战费支出国币一十八万万元。（除此之外）尚有十余万万元可作政费。”⁽⁸⁾可见当时华侨汇款，是我国最大的资源，对战费、政费，都有重大关系。难怪日本政府及学者，都把抗战期间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⁹⁾

（二）人力与物力的支援。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的贡献，突出的是财力的支援，但又不仅仅限于输财方面。华侨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华侨青年回国请缨杀敌，有的更奔赴延安，转战敌后。滇缅公路开辟时，就有数千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维修工）回国服务。此外，还组织战地救护队、服务团等，并相应捐赠药品、医

疗器械、救护车，乃至征募寒衣等等，现简要分述如下：

(1)华侨青年回国直接参加抗战。在“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怒吼声中，不少热血华侨青年，中止学业或放弃原来的职业，纷纷回国从军杀敌。人数在万人以上。当时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特设华侨特别班。空军军官学校也招收华侨青年受训。仅菲律宾一地，就有青年六十二人回国参加空军。②许多华侨青年为了追求真理，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经过“抗大”等革命学校短训后，即奔赴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仅1938年5月至8月的三个月中，经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华侨青年就有七十八人。③在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不少华侨青年捐躯沙场。突出的如1940年4月26日英勇牺牲在晋绥边区的李林（女），就是荷印华侨青年。她回国后投笔从戎，先后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委，一二〇师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等职。李林平时沉静寡言，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当临阵杀敌，骁勇异常。牺牲时年仅24岁。贺龙将军称她为“民族女英雄”。中共中央妇委发布唁电，表示哀悼。④

(2)招募华侨机工、组织救护队、服务团等回国服务。1939年底广州沦陷。不久，河内昆明铁路也封闭。我国国际运输几乎断绝。西北公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汽车运输，每月运不上一千吨物资。因此，国防军需几乎全靠新修建的滇缅公路（自云南的昆明经下关至缅甸的腊戍），该路全程千余公里，不但高山峻岭、崎岖险恶，而且工程初竣，路基未固。当时国内缺乏熟练汽车司机，南侨总会应西南运

输公司要求，代为招募机工回国服务。前后九批，共三千二百多名。这三千二百多名热心救国的南洋华侨，离开温暖的家园，有的还放弃优厚的收入，千里迢迢，服务于滇缅公路上。如有一机修工，每月收入新加坡币二百多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携带全副机器工具，应召回国。^②由于西南运输公司负责官员的贪污舞弊，机工“待遇甚劣……如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站段无车屋，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备，辛苦难以言状。”^③但是为了抗日救国，机工们还是任劳任怨，坚持到抗战胜利，为民族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

除南侨总会组织的机工外，南洋各地还有许多自发组织的机工回国服务团（队），每团（队）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上百人不等。他们回国后分散到各战区服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和祖国人民一起流汗、流血，表现出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无名英雄的业绩，是不应被忘记的。例如郭沫若记述了1938年他在武汉遇到一个卡车司机的感人事迹。那是“从马尼刺（菲律宾首府）回国服务的一位华侨青年。据他说，他在马尼刺还有自家用的汽车。回国后被分派在九战区服务，不久便得到疟疾，隔两天发一次。就在回武昌的那一天，在路上他的病发了，我劝他停下来休息，他却不肯，因为前方急于要车子，于是在发寒冷的时候，他把军毯来裹在身上，仍然开驰着。待到发出高烧，终究不能支持了，不得已才停了车，倒在路旁的草堆里睡了一个多钟头。……他这种爱国的热诚，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吗？”^④又如越南华侨江侠，原与长子江洁明在西贡开办华文学校。抗战后，江

洁明决心奔赴延安投考“抗大”。江侠本人也决定率越南司机回国服务团归国。于是出让学校，变卖衣物，遣其妻子携幼女回香港，露宿深水埗贫民区。美满的家庭，随着祖国山河的破碎而妻离子散。他这一毁家纾难的爱国行为，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②有的华侨在国外听说，八路军缴获了日军汽车，但没有人开。于是便组织服务团回到香港，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开着华侨捐献的救护车，从香港经广州、长沙、汉口、西安，跋山涉水，一直开到延安。③

除机工外，南洋各地华侨，根据战时的需要，还纷纷组织华侨救护队，派出西医，并配备救护车，回国开赴前线服务。突出的事例是新加坡华侨林可胜，他战前应聘回国任教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七七”事变，林可胜送眷属回新加坡，随即又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后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除办医校及训练示范病房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材制造厂。救护总站先后派遣一百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为抗战作出可贵的贡献。他舍弃国外的优裕生活，毅然奔赴国难的爱国行动，得到广大华侨的好评。1940年，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对林可胜专心任职及其努力精神，颇为赞许，并主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一万元给救护总站。④

回国参战的华侨中，还有活跃在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深入敌后的战地服务团，以及出生入死、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等。其中菲律宾《商报》记者张幼庭，第一个光荣殉难在祖国的原野上。⑤

菲律宾华侨总工会负责人沈尔七于1938年初组织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全团二十八人，参加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年夏天，沈等奉命再度出国，组织第二批“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五十多人回国，带回大量捐款及医药器材等物。1941年，沈又奉命第三次出国，组织第三批华侨回国时，发生了皖南事变，无法回到新四军军部，只得转移到广东东江支队。在一次反扫荡中英勇牺牲。^③

(3)捐赠药品、救护车及募集寒衣等短缺物资。南洋华侨除以财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外，更适应战争需要，募款购置飞机、救护车、药品及医疗器材等，在物力上也作出贡献。当时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在南洋各埠设立支会，委任当地有名望的华侨商人为支会会长，并按照航空会鼓励办法规定，凡个人或团体捐献国币十万元者，即以一架飞机命名之。如××妇女号、××学生号等。当时在中国战场上就有三架“缅甸华侨号”飞机。^④又如菲律宾支会，原预备国币一百二十万元，购献一中队飞机，实际上大大超过。抗战初期，每年秋天都有征募寒衣运动，海外华侨无不积极响应。仅1939年9月，南侨总会接到电文后，在一个多月内就募得寒衣三十万套，折合国币五百多万元。至于国内急需的大宗药品如金鸡纳霜（奎宁丸）等，由于奎宁产于爪哇，荷印政府限制万隆一药厂出品，南侨总会便转商荷印各慈善机关四十余处，购得五千万丸寄赠祖国。其他如救伤袋，仅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一处，便捐赠了十万个。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南侨总会规定，华侨筹款一概汇交重庆

政府行政院。当各地侨胞听说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在敌后战场屡挫敌寇、忠勇卫国，却得不到华侨的捐款及其捐赠的物资，便纷纷主动直接汇寄在香港的廖承志（当时香港的《星岛日报》等报纸，时有这一类报道）。特别是自八路军朱总司令通电^②吁请国内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予以防疫、防毒等工具的援助之后，海外华侨更是踊跃捐赠，将款项及物资汇寄香港，请廖承志转交。

(三) 抵制日货、罢工、辞职等斗争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南洋华侨便发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为支援祖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一种斗争形式。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洋华侨再次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许多过去经营日货的华侨商人，激于民族义愤，纷纷转卖国货。有的地区更成立了专门的“抵制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号召华侨不买、不卖、不用日本货。有的地方还组织了“青年铁血团”，秘密执行对奸商的制裁。铁血团在各地布满侦察网，调查货物的出入口情形，对于贩卖日货的奸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口头警告、罚款，以至割耳朵等处罚。这种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收到了相当的成效。日本大阪市在1939年，派人到南洋各地视察，写了题为《排日中心的南洋》的报告，承认“事变前，新加坡方面自日本的输入，每月达叻币四百万元。事变后即减为每月百万元。……以前，单食品一项，曾输入五十万元，现在已完全没有了。”由于“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常帮助经济困难的商人，而防止破产等事情。对于素来贩卖日货，因抵制日货而遭受损失不能营业者，都借予流动资金，俾可贩卖美国货、英国货或德国货。于是常有这样说：‘中华总商会老是比总领事馆走前一步’。有许多人以为抵制日货，中国（华侨）商店也受到困苦以至倒闭。这种观测，对新加坡方面的商店言，是完全错误的。……总之，新加坡的抵货是很彻底的，即使是日本人家所用的女仆，欲买日本的面粉和

面霜，也因监督很严，不能走到日本店中去。日本货虽然跌价，其来无法销售何！”③

与此同时，在日本企业中的华侨工人，也纷纷罢工、辞职，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抗议。当时在马来亚，日本财阀控制了相当部分的铁矿，雇用了大批的华工。如星洲龙运铁矿公司，雇用华工达五千名；丁加奴州的登根铁矿，也有华工三千名。当华工知道铁矿石运回日本，用以制造屠杀中国同胞的枪炮时，便集体罢工、辞职。这种爱国义举，首先由柔佛州的峇都巴辖日营铁矿的华工发起的，不久斗争浪潮波及吉兰丹、丁加奴各州的日营铁矿。这些斗争得到新加坡等地广大侨胞的同情和支持，新加坡华侨以福建会馆的名义募捐帮助罢工工人，解决生活问题和回国的川资。原意继续居留的，也代为介绍职业。从而使这场斗争得以坚持下去，使日营铁矿遭受沉重的打击。

（四）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

南洋华侨在财力、人力与物力上，对祖国的抗战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在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的宣传鼓动中，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侨总会成立后，华北汉奸江朝宗、池尚同、王大贞等二十一人，利用旧关系，联名给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发电，要求他领导南洋华侨，支持对日“和平”。对此，陈在复电中加以痛斥，指出：“卖国求荣，……终必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④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当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

“和平”谈话，准备与敌人妥协。陈嘉庚当即以南洋华侨总会名义，打电报质问。待确知汪精卫坚持对日妥协时，便公开谴责汪精卫等于秦桧，卖国求荣。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出面劝阻，陈嘉庚不但断然拒绝，还以国民参政员名义，打电报给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议案，建议确定：“敌人未退出我国之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列入提案时文字上改为“敌未出国土之前，言和即汉奸”）。当时担任议长的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提案很快获得通过，人心大为振奋，全国舆论皆为之赞扬不已。邹韬奋当时报道说：“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⑤

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特聘南来的胡愈之担任主编。星系报业中的《星洲日报》，也聘请著名作家郁达夫负责该报副刊。这些报纸在推动南洋各地华文报纸，揭露汉奸卖国行径，宣传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对祖国的进步文化事业，以陈嘉庚为首的广大爱国华侨，也一贯给予大力的支持。1936年，钱俊瑞、胡耐秋等利用海外关系筹集资金，以华侨名义创办“上海引擎出版社”，出版《现世界》半月刊。因宣传全民团结、联合抗日，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秘密禁令。陈嘉庚支持该出版社提出抗议，说如果禁止华侨办刊物，讲救国，今后政府要向华侨募捐等等，恐怕就不容易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撤销了禁令。又

如宣传抗日的上海《国民日报》（后改名《神州日报》），由于国民党政府停止津贴，无法维持，也是陈嘉庚出面，向新加坡黄梨公局（菠萝业公会）商捐，从1939—1941年秋，逐月补助国币三千元，使该报得以继续出版。

皖南事变后，范长江、夏衍等到香港筹办“国际新闻社”，也得到陈嘉庚的慷慨资助。范长江在为《华商报》组织股份公司时，请陈嘉庚合作，陈即认股半数，并先汇港币二万元，大力促成《华商报》的刊行。同年2月，邹韬奋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周刊，陈嘉庚也按月从新加坡汇款加以支持。

南侨总会为了“鼓励祖国同胞，增加抗战民气，及回（南）洋报告侨众，增益义捐及多寄家费以加外汇。”^{③⑥}在1939年冬发起组织了由南洋各属华侨筹赈机关代表组成的“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由六十六高龄的陈嘉庚亲自率领。慰劳团到达重庆后，即分为三个团，分三路深入到南北各个战场进行慰问视察。为了节省国家的物力，陈嘉庚规劝各团务必辞谢应酬，膳宿费自理，团员所到之处，不住招待所，而住公共机关，睡自己所带的帆布床。陈嘉庚本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阻挠，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去慰问。目睹耳闻，观感之余，使他无限振奋，“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③⑦}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回到南洋

后，他不断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事实，赞扬延安和边区的廉洁奉公，军民合作，同仇敌忾。通过回国慰劳团的报告，大大地提高了广大侨胞的思想认识水平。刚正不阿的爱国老人陈嘉庚也发展成为南洋华侨的一面光辉旗帜。^{③⑧}

综上所述，正如当时延安《新中华报》社论所指出的，“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③⑨}

三

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至今已快四十年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南洋华侨发扬了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以赤子之心，克尽天职，对祖国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战后，神州大地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老一代华侨梦寐以求的夙愿实现了。

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东南亚各国也相继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广大华侨为了适应当地的形势，绝大部分已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为当地的公民，不再是具有中国国籍的华侨了。这是符合我国制定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同华侨众多的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符合华侨的长远的、切身的利益，也符合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④我们相信，他们将一如既往地同当地人民一起，继续为所在国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希望他们促进所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对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那一部分华侨，我们也希望他们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同时，继承和发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在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中，在祖国“四化”的建设中，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侨务委员会编印：《侨务十五年》，1947年4月。

②傅无闷主编：《南洋年鑑》，1939年版。

③《国际劳工通讯》第七卷，第七期。

④廖承志：《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见《新华月报》1978年(1)。

⑤《新中华报》1941年3月6日，第二版。

⑥《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版，第135—136页。

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1033页。

⑧同④

⑨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0页。

⑩南侨总会编：《南侨正论集》，第155页。

⑪范长江：《陈嘉庚先生印象记》，见《新中华报》，1940年5月31日。

⑫《解放日报》专论，1941年12月12日。

⑬南侨总会编：《大战与南侨》，新加坡1947年版，第47—48页。

⑭同⑨第345页。

⑮高事恒：《南洋论》，第264页。

⑯《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22—23页。

⑰同⑮第264—265页。

⑱同⑨第265页。

⑲市川捷二郎：《陈嘉庚と华侨の政治資金》，见《东洋学报》第五一卷，第二号。

⑳祝秀侠总编：《华侨志·总志》，台北，1956年版，第473页、第493页。

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资料》转引自上海《社联通讯》1982(10)。

㉒《新中华报》，1940年5月28日。

㉓同⑨第85页。

㉔同⑨第85页。

㉕郭沫若：《洪波曲》，1979年版，第41页。

- ②⑥香港：《大公报》，1938年11月4日。
- ②⑦全国侨联：《侨联动态》，第二十二期。
- ②⑧同⑨第211—212页。
- ②⑨延安《新中华报》社论，1940年6月4日。
- ③⑩《文物天地》，1981(1)。
- ③⑪黄警顽：《华侨对祖国的贡献》，第220—221页。
- ③⑫《新华日报》，1938年3月29日，第二版。
- ③⑬该文发表于《东洋贸易研究》1939年六月号。转引自黄警顽：
《华侨对祖国的贡献》，第301—304页。
- ③⑭同⑨第81页。
- ③⑮邹韬奋：《抗战以来》，第53页。
- ③⑯同⑨第94页。
- ③⑰《陈嘉庚言论集·自序》。
- ③⑱《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9日报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嘉庚避难爪哇安全返回新加坡，重庆各团体闻讯后举行了一个“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给大会送了一幅单条，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字。
- ③⑲延安《新中华报》社论，1940年6月4日。
- ④⑩同④

